

#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李大龙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国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关键词 中国 天下 古代中国疆域 形成轨迹

作者李大龙,1964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地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邮编100006。

关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20世纪20—40年代先后出版的葛绥成先生《中国边疆沿革史》、夏威先生《中国疆域拓展史》、童书业先生《中国疆域沿革略》等都有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具体论述。今人对中国疆域的研究也多涉及疆域形成的问题,如马大正等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过程》、刘宏焯先生《中国疆域史》等也对古代中国的疆域形成过程做了更为系统的阐述。这些探索虽然只是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阶段性分析,但为我们从理论上探索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国外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出现“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等论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故国外的一些学者将古代中国等同于汉族建立的王朝。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完成了疆域的凝聚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探讨其中的原因将是揭开中国古代疆域形成规律的钥匙。综观中国历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  
文化供应社 1941 年版。  
开明书店 1946 年版。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武汉出版社 1995 年版。

即古代中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最终在清代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华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很早就存在一个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理想中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之中,但这种观念却影响到了众多的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导致了各民族为之不断争斗,并在争斗之中不断密切关系,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出现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下面,本文试图从历史上各民族对“中国”认同的角度,从宏观上探索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规律,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尽管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以“中国”为国号,但“中国”一词的出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衍变过程,以往学者已经有过众多详细考证,尤其是1981年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之后,许多学者开始探讨“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衍变,但可惜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综观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存在某些差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一,多数学者不认同古代“中国”一词具有国家政权的含义,而是认为其是属于一个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如翁独健先生认为:“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张璇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陈连开先生认为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中国”有多种含义:一是“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以与四方诸侯相对举”。二是“周灭商以前,以丰镐为中心的周人区域为‘区夏’,即‘夏区’,克殷以后,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称‘中国’或‘土中’(即中土),是指夏代中心地区;又以商代的中心地区为‘东夏’。于是‘中国’包括丰镐、雒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即后世称为中原的地区。以此地域与远方各族对称,则与商代以‘大邑商’与各‘方’相对而称的含义相通”。三是“指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等等。

其二,在认同“中国”一词是地域概念的同时也认为有指称“中央之国”的含义。如牟一之先生认为:“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做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

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费孝通主编:《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天下’。”杜荣坤先生认为:“‘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据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初含有‘京师’、‘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陈玉屏则在杜先生的基础上从“中国”之“中”的含义进一步认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等等。

综合分析上述各种说法,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不过第一类观点将“中国”一词完全定位为地域或文化概念,而忽略“中国”一词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似乎并不全面;第二类认识虽然关注了“中国”一词具有“中央之国”的含义,但缺乏可信的论证,或阐述本身存在矛盾,也并不完善。笔者不否认“中国”一词具有地域或文化的含义,但认为“中国”一词最初的产生即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它不仅是王权的标志,也是古人“天下”观中权力中心的代名词。理由如下:

其一,古代“中国”一词用于指称“京师”并非单纯表示地域,也用于指称王权。“中国”的含义之一是指称“京师”,这是以往学者们普遍关注且认识较为一致的,而经常被用来作为证据的即是《诗·大雅》所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等等。将“中国”确定为地域概念的认识应该说更多地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的,“京师”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是一个地域范围,由此得出的用于指称“京师”的“中国”属于地域概念似乎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学者们将“中国”认定为地域概念并没有对“京师”所具有的政治含义给予充分的考虑。实际上,“京师”之所以称为“京师”,是因为王或天子存在于该地,某一地域只有和王权结合才会被称为“京师”。因此,“京师”并不仅仅代表着某一地域,也是王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正因为“京师”代表着王权,所以“京师”在先秦时期诸侯国中才能够称为“中国”,这应该是“中国”一词产生的直接诱因,其中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一词在后来的发展中更多的具有了地域和文化的色彩就忽视了其政治含义。

其二,古代“中国”一词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但在出现之时即有了泛化的趋势,用于指称周朝的施政范围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夏各政权。不少学者否认古代“中国”一词具有国家政权的含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用近现代关于国家的认识来分析数千年前的历史,而没有考虑到“中国”一词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之上的铭文中有“中国”一词,据笔者所知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何尊上的铭文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一表述也得到了文献的印证,《尚书·梓材》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以往学者们多认为这里的“中国”是指称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如陈连开先生即认为:“(后者)即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付与周武王治理。这变可与上述铭文互相印证,‘中

半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国'显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但是这并非惟一的解释,仔细分析,认为所谓“宅兹中国”、“皇天既付中国”中的“中国”是指周王施政的范围似乎更为恰当,此与《诗·大雅》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记载中“中国”的含义应该是一样的。关于周朝的疆域范围,《左传》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学界一般以此说明周朝的疆域,不过这或许是周王政令能够有效实施的区域。其后“中国”的含义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不仅用来指称周朝的施政范围,也用于区分不同的人群以及华夏政权。《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此处的“中国”很显然已经用于指称华夏人,而且这种含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引申为指称华夏各诸侯。如在《春秋》、《左传》、《国语》中对齐、鲁、晋、陈、蔡等都以“中国”、“华夏”、“诸华”等称之,秦、楚则初并不在“中国”之内,战国时期才被纳入“中国”之中。

其三,“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据有此地是“正朔”的重要表现。《诗·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王权为“天下”权力中心的经典表述,也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天下”观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之含义由“京师”向华夏乃至中原的泛化,实际上也是“天下”权力中心和王朝政治格局演变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国语·周语上》有“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的记载,这是先秦时期王权和政治格局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其中王权是核心,而“甸服”的区域也称为“王畿”,是京师所在地,故而也称为“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周室衰微,诸侯林立,一方面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华夏诸侯能够抵御夷狄的侵扰并企盼华夏统一,另一方面诸侯为在争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代表王权的“中国”由之成为了一个旗号,于是出身于华夏的诸侯在《春秋公羊传》中都被纳入了“中国诸侯”的范围,晋国对属于夷狄的楚国的抵抗则被称为是“桓公救中国”的行为。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从人们的意愿,出身于夷狄的楚、秦则处于诸侯争战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涵盖范围于是在战国时期也包含了楚、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对中原的统一,政治格局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皇权的确立。嬴政对中原的统一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于是有了“皇帝”的称呼,“皇帝”自此成为了“天下”的权力核心和主宰。二是中原凝聚为一个整体,并以“中国”称之。由于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对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管理,之后又将郡增加到了40余个,结束了中原地区诸侯分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的统一,“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地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于是“中国”更多的具有了指称中原的含义。秦朝大一统带来的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古人的“天下”观,皇权和中原(中国)的紧密结合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随着汉多民族统一王朝的持续存在得到了强化,“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即是对这种思想的精确表述。早在先秦时期既已经出现了“占据了天下之中心地带,才能有效地实施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217页。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汉书》卷64下《严助传》。

对“四土四方”的统治”的观念,而随着秦汉的长期统一,被称为“天下的中心地带”的“中国”已经由“京师”、“王畿”发展为秦汉时期的郡县范围,据有“中国”才能成为“天下共主”,正朔王朝的观念也由此得到了不断强化。

因此,“中国”一词最初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或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政治概念。尽管古代中国用于指称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但“中国”为“天下”中心,据有“中国”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这也是历史上虽然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综观中国历史,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的争夺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不仅成为华夏(汉族)内部各种势力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成为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众多民族政权南下争夺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正是古代中国的众多政权包括边疆民族政权对“中国”的持续争夺,不断波及着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最终促成了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同时也将众多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

## 二

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的观念虽然形成于中原的汉族之中,但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真正能够使之实现的只有汉、唐两朝,更多的时候则是众多的王朝或政权围绕“中国”的控制权展开争夺。由汉的大一统到唐的大一统,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唐代的疆域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治体系更加完善、深入,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的观念发展为“天子以四海为家”。

迄至唐代,“九州”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的代名词,而汉代的“九州”在人们的观念中基本上是实施郡县制度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汉书·地理志》开篇的论述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该志先述禹所置九州地望,后言“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尽管从具体施政范围看,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护羌校尉管理西羌地区,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鲜卑等边疆民族地区,但这些区域并没有包括在《汉书·地理志》的叙述范围之内,这是汉朝统治者乃至汉代人疆域观念的一个具体表现,同时也是“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观念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反映。换言之,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九州”即郡县是天子施政的范围,对西域、西羌、乌桓、鲜卑等地区的经营更多地是出于解决匈奴问题的需要,或者是为维护郡县地区安全而被迫采取的经营行为。但是,汉朝对边疆的经营虽然有很大被迫的成分,不过汉朝的这些做法却对唐朝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唐朝建立了由安西、北庭、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六大都护府为主的完善的都护府体制,将辽阔的边疆纳入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而随着有效管辖区域的扩大和深入,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一

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参见拙著:《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些明显的变化,“天子以四海为家”即是其中之一。“四海为家”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频繁出现,如《旧唐书·懿宗本纪》载:“朕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旧唐书·礼仪二》载:“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新唐书·陈子昂传》载:高宗崩,陈子昂上书言东都可以营造山陵,其中有:“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等等。

由“九州为家”到“以四海为家”既是汉唐统治者构筑“天下”统治体制理念不同的表现,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入主“中国”并得到汉族认同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而言,这一变化则反映着王朝直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和“中国”与边疆的密切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现实。

其次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国”得到了认同,尤其是汉族的认同。

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核心内容的皇权至尊认识,随着汉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也影响并为边疆民族接受。更始二年(24)匈奴单于舆不仅拒绝刘玄让其称臣的要求,反而答复:“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匈奴要求更始皇帝“尊我”显然是受到了汉族“天下”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匈奴之后不断为边疆民族付诸行动。先是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争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永兴元年(304),匈奴人刘渊还假托为刘氏后裔,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并“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但到了氐人苻坚建立前秦时则对大臣言:“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不仅自诩自己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各族的拥戴,而且认为出于华夏的东晋也应该“宾服”于他:“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食,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如果说,“五胡十六国”的出现并没有得到汉族史家的认同,那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则实现了这种突破。鲜卑人对“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是赤裸裸的,没有一丝的遮掩。在鲜卑政权统治者拓跋珪将国号由代改为魏的诏书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的内容:“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诏书中出现的“朕”、“未定九州”、“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扫平中土”等等,已经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了拓跋珪给自己的定位,即他是“天子”,而且是以“华夏正统”的身份出现的,并将统一中国作为最终的目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北魏开始兴兵南下进攻南宋,虽然没有实现灭亡南宋的目的,但却将疆域扩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区,而更为重要

《汉书》卷94下《匈奴传》。

《资治通鉴》卷85,惠帝永兴元年十月条。

《资治通鉴》卷103,晋宁康元年十一月条。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魏书》卷2《太祖纪》。

的是北魏“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得到了汉族史家的承认，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北魏成为了第一个被纳入到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中的由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专门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魏书》被纳入到了正史序列就是表现之一。

从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看，边疆民族政权入主“中国”争夺正统王朝的行为更多的是自己主动的结果，这表明源出于汉族的据有“中国”可以号令“天下”的观念得到了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的认同，而汉族史家对北魏正统王朝地位的承认则是汉族接受这种现实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双向认同的结果，一方面改变了汉族传统的“天下”观，开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边疆民族入主“中国”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北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凝聚；另一方面是突破了“严华夷之辨”的界限，至唐代，“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天下”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

再次是“华夷一家”观念得以确立并成为“治国”理念。

“华夷一家”的观念早已有之。《汉书·匈奴传》载：元帝初，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回匈奴，“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这可以说汉代即已经有“华夷一家”观念的具体事例。不过，从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写入盟约的目的看，所谓“一家”恐怕作为缔约一方的韩昌、张猛也不会相信。但是，出现于汉代的“华夷一家”观念进入唐代之后却频繁出于唐朝皇帝之口。《旧唐书·高祖本纪》载：贞观八年（634），“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载，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不仅如此，尽管我们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中也可以见到很多民族歧视的内容，但“华夷一家”依然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中大量边疆民族官员的任用和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即是典型的表现。如果说，“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在汉族史家眼中还是汉族为主体王朝主宰“天下”的话，那么众多羁縻府州被纳入《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则表明“天子”的直辖范围得到了扩大，“中国”涵盖的范围自然也比汉代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而随着众多边疆民族地区被纳入到直接管辖区域和大量边疆民族官员的任用，则反映着作为“天下”主宰的唐朝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族王朝，“天下”已经变化为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

最后是“中国”在“天下”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应该说，迨至唐代，虽然古人的“天下”观出现了上述一些变化，但“中国”为“天下”核心的观念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观念的强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实现对“九州”的牢固统治是大一统王朝必须完成的职责。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对唐代影响很大，唐朝不仅将

仅《新唐书》就为近百位边疆民族首领或官员分别立传，这些源自不同族属的“蕃将”多数在唐朝中央或内地任职，有些甚至官位显赫，反映着唐朝在官员任用方面的平等态度。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汉代的都护体制推广到了整个边疆地区,而更重要的是唐朝统治者确立了实现汉代郡县的统一是大一统必备条件的观念。《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载:“(贞观十九年)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谓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所以发自洛阳,唯噉肉饭,春蔬不进,虑有劳烦,庶同艰苦,一劳永逸。’”唐太宗所言“辽东,旧中国之有”、“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以及由此展开的对高句丽政权的统一行动等即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其二是“中国”和“四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新唐书·李大亮传》载,李大亮上书唐太宗:“臣闻欲远者必自近。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天下”是由华夏和夷狄构成的观念在先秦时期既已有之,但更多地是强调夷夏之间的差别,并不谋求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从李大亮所言看,进入唐代之后,在人们的观念中边疆虽然还是处于附属的区域,但“本根”、“枝叶”的比喻表明边疆和内地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三是据有“中国”即可以成为“天下”中心。虽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但“中国”在人们观念中的绝对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还有被强化的趋势。唐高祖李渊曾经有不让高句丽称臣的想法,但遭到了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值得关注的是,此处的“中国”被喻为“太阳”,而“夷狄”被喻为“列星”。此处“中国”很显然是指唐朝,而唐朝被喻为“太阳”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唐朝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

在唐代人观念中出现的上述一系列变化,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唐代之后边疆民族争夺“天下共主”并最终出现元朝的大一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 三

唐代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又一次由分裂到统一的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北部更替,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十国分立;其后衍变为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最后是以蒙古为主体建立的元朝实现了大一统。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贯串其中的一个主线即是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不断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值得关注的是,“天下共主”的换位并没有像世界其他文明那样导致文明主体民族历史的中断,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依然延续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实现局部统一或大一统的各王朝都以“中国”正统王朝自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前所述,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主宰的企图在两汉之交的匈奴中即已经出现苗头,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最终是以北魏实现对中国北部的统一而结束的。907年唐朝灭亡之后,北疆民族又开始了新一轮争夺“天下”主宰的浪潮。契丹在唐王朝时期开始崛起,至五代时期已经成为北部草原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标志着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阿保机时期,契丹一度想进军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但917年在幽州被建立后唐的沙陀突厥人李存勖大败,迫使阿保机发出了“天未令我到此”的感叹。但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契丹入主中原争夺“天下”的野心,至耶律德光时期(927—947),契丹通过参与中原地区的混战,不仅获得了后晋的称臣纳贡,而且后晋“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契丹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北宋建立之后,宋、辽之间围绕“十六州”的归属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宋、辽之间的关系虽然在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开始转入以和平交往为主的时期,但辽却获得了宋皇帝称萧太后为叔母、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争夺“天下”霸权中处于劣势的宋王朝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就有了其后的联合女真共同灭辽的同盟。1122年,宋和女真建立的金朝按照约定进攻辽朝,但宋在进攻燕京中表现出来的软弱刺激了金朝,1125年在灭辽之后金朝开始大举进攻宋王朝,并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金朝也由此辖有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成为一个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的多民族王朝。值得关注的是,辽金的统治者虽然出自契丹、女真,但并不认同宋朝的“正统”地位,相反却在许多方面将宋视为“藩臣”,而宋朝尤其是南宋统治者则“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主动接受了金朝为“天下共主”的结果。

如果说辽金对“天下共主”的冲击由于还存在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宋朝而没有得到完全认同的话,那么元朝的建立及其实现对中国的统一,则使北方民族对“天下共主”的冲击有了一个最终结果。元王朝统一中国后,虽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自认为是“华夏正统”。创建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曾经对部下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其所有一切,迫其结发之妻痛哭,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元朝秘史》第225节载有成吉思汗对其子说的话:“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扩大营盘,占领国土。”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强大蒙古汗国。不过,尽管成吉思汗将“天下”视为征讨的对象,但其子孙则是以“中国”继承者自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1265)曾经颁书给日本:“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在元武宗颁布的诏书中也有“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一语。这些记载无一例外的表明元朝统治者对“中国”也有着强烈的认同,这或许也是元朝被后人视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原因之一。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资治通鉴》卷28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6页。

《元史》卷208《日本传》。

《元史》卷22《武宗一》。

辽、金、元三朝对“天下共主”的冲击以及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而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辽、金、元等王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得到了认同,“中国”已经变成更多民族之“中国”。

如果说,汉唐时期人们对入主中原的非华夏王朝还只承认一个北魏为“中国”的话,那么到了宋辽金元时期,随着辽、金王朝的局部统一及元朝大一统的实现,宋、辽、金、元都成为了“中国”的代表。而之所以如此,各王朝都以“中国”正统王朝自居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中国”的认同还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认才能名副其实,分别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被纳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应该是这些王朝对“中国”认同得到承认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值得关注的是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在对“桃花石”的释义中,将“中国”分为三部分:上秦为宋朝、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喀喇汗王朝统治的喀什噶尔。张广达先生据此认为:“参照其他的穆斯林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马合木·喀什噶里关于整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亚地区人们的普遍认识。”如果这一认识正确,那么至少说明在中亚人们的眼中,“中国”(秦)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涵盖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是中原汉族地区,也包括了辽(契丹)的统治区,甚至位于西域的喀喇汗王朝区域也属于“中国”。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涵盖范围在扩大的同时已经突破了为汉族专有的状态,成为各民族共有之“中国”。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对于促进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凝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其次是辽、金、元等王朝成为“天下共主”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和北疆地区的联系,而且也将其他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拉入了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进程。

汉唐时期,由于受到“夷夏有别”观念的影响,汉、唐两朝对边疆的经营更多地是为了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全或得到“德被四夷”的赞许,经营中“羁縻”的色彩十分浓厚,在经营中遇到困难而放弃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而辽、金、元三朝虽然兴起于边疆,是以边疆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但这些王朝对中原的经营则要积极、主动得多,不仅少有轻言放弃的情况,而且统治中心不断南移。辽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不仅采取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实施直接有效的统治,而且和宋朝展开了长期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这些政策的实施,自然使“幅员万里”包括属于汉人心目中“中国”范围的“燕云十六州”的辽阔区域成为了一个整体。而在辽朝的基础上,以女真为主建立的金朝,其疆域“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曷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

---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西汉王朝曾经放弃对海南岛的统治,而东汉王朝也曾数次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参见拙著:《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辽史》卷37《地理志六》。

《辽史》卷45《百官志一》。

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更是包括了淮河以北辽阔的中原地区。如果说辽朝的政治中心还处于草原地区的话,那么到了金朝,今天的北京则成为了其中都。政治中心的南移,说明金朝已经将对中原地区的经营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无疑更加巩固了辽代以来中原和北疆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二者的“一体化”进程。

在辽、金的基础上,元朝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北,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面对辽阔疆域,元朝实施了管理更为直接、划一的行省制度,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包括大都在内的二十九路八州则被视为“腹里”,为中原和边疆的凝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元朝在西藏地区也实施了积极、有效的统治,将其划归宣政院统辖,在唐代即开始与中原有密切联系的西藏地区终于彻底走入了古代中国疆域的凝聚历程,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是多民族分布格局的进一步衍变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剧巩固了古代疆域形成过程中已有的成果。

元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将“天下”之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实施不同的政策。以往学者们多是从民族歧视的角度来评判元朝的这一做法,但是元朝的这一做法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对民族的划分,其标准更多的是依据降元的先后,而这在客观上却对五代以来民族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承认。蒙古人,包括兀鲁、忙兀、太赤乌、克烈、弘吉喇等部族,这些部族基本上已经成为蒙古民族的一部分。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畏兀儿、康里、阿速、唐兀、哈刺鲁等西域乃至中亚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东迁之后与中原地区的汉等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汉人,主要包括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之下的汉、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民族,这些民族在经过辽金时期的不断融合之后最终成为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南人则是指南宋辖区内的各民族。也就是说,四等人的划分虽然具有民族歧视的因素在内,但对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元朝还采取了民族迁徙的政策。蒙元时期各民族的迁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无论是从迁徙的范围还是规模上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史·兵志二》记载:“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也就是说,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为主,淮河以南地区则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戍守,但也有少量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目的是监视。为保证戍守军队的供应问题,元朝采取了屯田的政策,《元史·兵志三》对此有概要的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勺陂、洪泽、甘、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元史》卷91《百官志九》。

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也就是说,伴随着戍守和屯田,更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被迁徙到了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还是涉及的范围都是远超前代的。如元朝在云南戍守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人数在10万以上。民族的大迁徙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俘掠、戍守、出仕、流放、有计划迁徙、经商成为6种最主要的途径。

元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布格局的进一步衍变,是在元朝大一统的状态下实现的。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导致了一些民族的消失,也促进了一些民族的强大和新民族的形成,蒙古、汉等民族的发展壮大及回回民族的形成即是主要表现,而这种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原和边疆关系“一体化”趋势则起到了凝固作用。

#### 四

明清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古代中国的疆域进入了最后形成时期。《明史·地理志一》载:“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sup>1644</sup>年,崛起于东北边疆地区以满族人为主体的清朝入关,进而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清史稿·地理志一》载:“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sup>注</sup>之伦,树颌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从统治范围、统治方式和统治理念上看,以汉族为主体的建立的明朝都是难以“大一统”王朝视之的,所谓“呜呼盛矣”名不副实,因为实际上明朝的“大一统”很大程度上只是汉族聚居区的“大一统”,也即传统“中国”范围内的“一统”,“天下”依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对边疆的统治方式(军事卫所)更多的具有“羁縻”色彩,统治理念上则重新强调“夷夏之别”。清朝虽然是以满族为主体联合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其统治范围集历代王朝疆域之大成,所谓“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并非夸大之词,清朝在前代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开始以“中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使“中国”和“天下”的含义基本实现了重合,“中国”也由之具有了近现代国家的含义,这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清朝对明代以来重新成为社会思潮的以“夷夏有别”为主要内容的观念进行了有力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7—568页。

反驳，“夷狄”可以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观念得以确立。

由于唐朝之后没有出现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明朝的建立者又是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推翻元朝统治的，所以先秦时期形成的以“夷夏有别”为主要特征的观念在明代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肆意发展。取代明朝而实现大一统的清朝，虽然面临着和其他边疆民族王朝一样不被承认的遭遇，但对此却进行了有力反驳。对汉族传统观念进行批判虽然早在顺治帝时期就已经有过，但系统地反驳则是在雍正帝时期。雍正皇帝时期，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以先秦时期夷夏观为理论基础，肆意宣传对满族的歧视思想。针对这些人的言论，雍正皇帝进行了系统批判，据《大义觉迷录》卷1的记载，雍正皇帝首先明确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承认自己的“夷狄”身份，但却认为所谓“夷狄”仅是地域上的一种划分，“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否认这是“中外”划分的标准。并进而认为：“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狄，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等等。雍正皇帝对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儒士的反驳，虽然是为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争辩，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

关于“中国”正统的争论早在宋辽金时期即已凸现，但更多情况下这种争论是在一些具体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诸如宋、金之间关于“礼交聘礼仪”的斗争等，并没有形成系统、明确的理论，汉族士大夫对辽、金、元三朝“中国”正统王朝地位的承认更多的也是迫于对实事的承认，这也是为何在清朝初期又出现关于“中国”正统争论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应该说，雍正皇帝的辩驳，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使清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得到更广泛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清朝认同“中国”的一个重要表现，表明清朝的大一统并非是异族侵略，而是边疆民族王朝对前代大一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前代“中国”已经变成更多民族之“中国”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在清代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其次，清朝的统治理念在前代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之也带来了统治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人为确立的阻碍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得以废弃，为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提供了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保障。

观念的论争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清朝的统治理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此也导致了清朝边疆统治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清朝边疆统治观念和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诸如彻底否定了传统的“羁縻而治”思想，代之以“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通过“改土归流”等政策的推行，对边疆地区实施更为具体的管理方式。元代以来边疆地区广泛推行的“土司”制度虽然顺应了当时边疆稳定的需要，避免了边疆民族政权的壮大，但毕竟还带有浓重的“羁縻”色彩，土司独据一方也成为中央政令在边疆民族地区彻底贯彻的障碍，因此在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条。

参见赵永春：《辽宋金元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235页。

《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条。

明代“改土归流”即已经成为边疆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入清代,“改土归流”政策更是在边疆地区广泛推行,清朝对边疆的统治由之变得更为深入、具体,加速了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内地化趋势,为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如彻底放弃了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思想,代之以对边疆民族的积极统治。康熙曾经“谕扈从诸臣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放弃长城对于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而言是一个革命,自此之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人为设置的阻碍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草原地区融为一体长达数千年的长城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长城内外在政治地理上加速了“一体化”进程。清朝这些观念的转变,无疑彻底改变了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状况,对于边疆地区和内地融为一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应该说,清朝在边疆治理观念和治理方式上的变革,一方面是顺应了边疆与内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关系和“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方式的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清后期的边疆建省即是这种“一体化”发展的结果。

最后,清朝以“中国”的名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邻国划定边界,不仅是古人观念中“天下”与“中国”含义重合的表现,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进入了最后形成阶段。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地理知识的限制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影响,古人一般用“天下”来指称王朝的疆域,故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大赦天下”之类表示王朝政令实施范围的用语,而“中国”虽然也有指称王朝的用法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统治中心(中原)的含义。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清朝直辖的18个省依然以“中国”称之,而“天下”也保持着泛化的指称政令实施范围的含义,但“中国”却有了指称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与“中国”出现了重合的倾向。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了解决沙俄向东扩张而引发的边界争端,清朝和沙俄签订了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清朝依据《尼布楚条约》所立界碑全文为:“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一、将雅克萨地方鄂罗斯所修之城尽行除毁,雅克萨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还。”很显然,在条约中“清朝”和“中国”是可以互称的,“中国”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该条约的满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

《清太宗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条。

清朝边疆观念和政策的变化,参见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

此。也就是说,最迟到康熙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中华各民族也由此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

“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既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为之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中国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形成阶段的结束。

## 五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形成于汉族中的“中国”一词由指称京师发展到和“天下”一样指称一个主权国家,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和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基本是一致的。

二是形成于中原汉族之中的“中国”观念在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的交往中也传播到边疆地区,并为边疆民族政权尤其是以北疆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众多王朝所吸纳,由之参与争夺“中国”正统也成为了众多王朝包括边疆民族政权的一种政治选择。众多王朝或政权参与争夺“中国”正统一方面是中华大地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必然趋势。

三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汉民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一词为汉族首创,更重要的是“中国”(中原)为“天下”中心的思想也是形成于汉族。不过,“中国”发展为和“天下”含义相同,指称一个主权国家,更多地则是边疆民族对“中国”认同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今日中国都并非汉族所独有,而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中国。

[本文责任编辑 于逢春]

---

参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页。

关于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最后期限,学界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考虑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古代中国的疆域一直处于一个没有外来势力介入的自然发展状态,笔者将古代中国疆域的最后形成时期确定为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

# CONTENTS

## THEORY OF BORDERLAND STUDIES

### **The Unification of “ Zhongguo( 中国) ”and “ Tianxia( 天下) ”**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ncient China 's Territory Formation** ... **Li Dalong( 1)**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ncient China 's territor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ord “ Zhongguo ” had abundant political meaning besides it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By taking possession of “ Zhongguo ” which was seen as the center of “ Tianxia ”, a dynasty can become orthodox. This idea brought a big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a 's territory. The Han and China 's Northern frontier ethnic groups had been fighting for “ Zhongguo ”. Until Qing Dynasty, “ Zhongguo ”, the core of “ Tianxia ”, unified with the multiethnic nation, complet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ncient China 's territory.

**Key Words :** “ Zhongguo ” “ Tianxia ” Ancient China 's Territor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 **On the View of State and “ Tianxia ” in Ancient China**

——**Historical Coordinate of Borderland and Borderline** ..... **Zhang Wen( 16)**

Modern concept of state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China. The view of “ Tianxia ” was held by every dynasty. Central dynasties did not think that other surrounding states had equal status with themselves. This view which was shaped in Pre - qin period had a far - reaching impact ,even accepted by dynasties built by ethnic minorities. Modern concept of borderline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 Only when China faced a powerful opponent , the view of “ Tianxia ” can changed in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state.

**Key Words :** “ Tianxia ” State Borderline

## RESEARCHES ON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 **The Guanshi( 关市)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Han Dynasty** ..... **Wang Zijin Li Yujie( 24)**

Northern boundary Guanshi began to play its role in economic exchanging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Han people 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since Han Wen Emperor Period. It still existed and functioned during the war period of Han Wu Emperor. The war damaged the Guanshi. The Guanshi brought economic prosperity to border area. some Guanshi was unofficial or illegal.

**Key Words :** Han Dynasty Northern Borderland Guanshi

### **A Study on Qing Dynasty 's Taxation of grain in Xinjiang :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Qing Government Archives about Kuche( 库车) and Shayaer( 沙雅尔) Kept in Oxford University** ..... **Wang Dongping Guo Hongxia( 32)**

Based on the Qing government archives kept in Oxford University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Qing Government 's taxation of grain in Xinjiang. For the private land owners and official land users , the two main forms of land occupancy , the tax was not decided by the size of land , but by the harvest , which shows a big difference with the Central China area. Ten times amount of the seeds was regarded as the actual harvest amount , on which the tax was made. Due to some factors , the tax data of every city